

# 跨越时空：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潘仲华<sup>1</sup>, 李凤新<sup>2\*</sup>

1. 内蒙古医科大学 体育教学部,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110;

2. 内蒙古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作为我国古代北部边疆的河套平原，自战国以来便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战争为始的弓马文化传播在开拓北部边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沟通、润滑和凝聚作用，蕴藏的包容互助、兼收并蓄和勇敢拼搏等精神为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目前研究而言，北疆弓马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探讨。北疆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相依、信念相同、文化相通、血脉相融和情感相亲的内在联系，还维护了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立足新时代，以北疆弓马文化建设为保障，加强各族人民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处理好、解决好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河套平原；弓马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北部边疆；传播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弓马”文化“丝路”传播与国家文化认同的研究》（22BTY093）

**第一作者简介：**潘仲华（1998—），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历史与文化。

**通讯作者简介：**李凤新（1969—），男（汉族），辽宁朝阳人，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E-mail:Lfx2222@163.com

#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e spread of bow and horse culture on the Hetao Plain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Zhonghua PAN<sup>1</sup>, Fengxin LI<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010110 China;*

*2.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010022 China*

**Abstract:** As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ancient my country, the Hetao Plain has been an important area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farming people and the north nomadic people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pread of the bow and horse culture, which began with wa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on, lubrication, and cohesion in opening up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mutual assistance, inclusiveness, and brave struggle contained in it has provided a solid social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ll ethnic groups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evels. However, as far as current research is concer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chery culture of northern frontier and the Chinese nation has not been deeply explored. The spread of the archery culture on the Hetao Plain in northern frontier has mad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common beliefs, cultural intercommunication, blood fusion, and emotional affinit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but also maintaine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northern border. Based on the new era,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ery culture of northern frontier as a guarantee, strengtheni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nation is of great value for handling

and resolving my country's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Hetao Plain; Archery and Horse Culture;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 Northern Frontier; Spread

# 1 前言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2019)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连接、沟通、润滑与凝聚作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各民族在数千年的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与凝聚了内容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不仅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还蕴含着中华文化共同共通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意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历史见证。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既是世居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时代呈现,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象演绎,实质上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理念,厚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意涵。(杨玠,2019)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多元,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属性。它是各民族在共同守护、开发和建设中原北部边疆的过程中逐渐凝聚而成的文化意识形态,不仅体现着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表现出同一地域内各民族赖以生息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一致性。北疆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二者不仅共生共存于承托实体与地域空间,也同心同轴于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线路,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孕育和滋养的成对观念体系,均是以自身发展为对方发展提供补益。(范君、詹小美,2018)

目前在我国北疆历史和文化的相关研究中,国外学者忽视了北疆与中原的紧密互动共融史实,以及历史中北疆和古代中国的隶属关系,造成有关北疆的历史文化游离于中华文化的假象(拉铁摩尔,2005;巴菲尔德,2011);而国内学者对北疆文化研究涉及定位(李大龙、刘壮壮,2023;朱尖,2024)、内涵特征(朝戈金,2024)、历史意义(刘志戩,2024a;崔思朋,2023a)、时代价值(康建国、翟禹,2023;王彦、吴楚克,2024)、建设路径(包银山,2024)等层面,为北疆文化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但是,从体育领域对北疆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间关系的探讨并未得到深入。

就北疆弓马文化而言,它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中不断演进,不仅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所表现出的特征之一,也是进步的社会活动中一个重要体现(李凤新,2008)。弓马文化是古代人类重要的生存手段(潘仲华、李凤新,2024a),更

是中国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在北部边疆史实活动中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承载媒介。它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变迁中承袭、发展与演变，蕴藏着包容互助、勇敢拼搏和兼收并蓄等精神（潘仲华、李凤新，2024b），见证并参与熔铸了中华各民族的休戚、荣辱、生死和命运与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逻辑基础。

鉴于此，本文在体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等多科学视角下，深入挖掘作为我国古代北部边疆的河套平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史中的定位，以及尽可能把握弓马文化的演进逻辑，才能更好地剖析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贡献、重要地位与作用，为北疆文化建设提供科学诠释和理论支持，对于处理好、解决好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1 北部边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共同的地域”是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前提（陈智、宋春霞，2021）。以地理学为视窗，从两个方面剖析作为我国古代北部边疆的河套平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的定位。一是河套平原在中国疆域开拓历史中的作用，二是河套平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本地域内多民族共融的作用。

“共同体”（community）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根据其词源可知，原意为“共同利益诉求以及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王露璐，2014）。就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它不是简单的“群体生活”，而是自古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存在的共同生活方式、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等。具体而言，“共同的生活地域”是这些共同点形成的基本前提。正如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认为的，地理因素的影响是中华文明绵延久远、未曾中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中华文明和其他人类文明的分布区域之隔绝程度举世无双，中国在除了元朝的大部分时间内，疆域的四周一直被沙漠、山脉与辽阔的海洋所阻断，这种隔绝的地域空间之意义是可以使中华民族在减少外来入侵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自身的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第359页）一言以蔽之，中国疆域相对隔绝的地理空间致使其西方的山川、东方和南方的海洋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唯有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正北方与西北方是中国疆域伸缩的重要地带

（韩茂莉，2016）。因此，处于北部边疆的农牧交错带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中意义特殊。河套平原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在阴山以南、长城以北、贺兰山以东和吕梁山以西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大部地区年降雨量在 150 至 400 mm 等降雨量线左右。它作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带（王绍东，2018），不仅是战国以来中原王朝国家治理特别是北疆安定的关键所在，更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例如，先秦时期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并在河套平原设云中、筑高阙，通过穿戴胡人的服饰和学习其骑射技术，从相同的生活方式上推动了河套平原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物质层面稳定的广泛交往；汉匈之争中国力的强弱决定河套一带和秦时“河南地”的归属，汉朝国力弱时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反之攻守异形，通过军事革新以在制度层面学习不同民族的骑射技艺，推动了不同民族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稳定的全面交流；以及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南迁至阴山河套一带修筑盛乐城为代国中心，通过对中原制度与文化的学习，在精神层面推动了农耕与游牧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为北疆的安定贡献了重要力量。又如，唐朝开元十年总管张说在此所筑的西受降城（赵占魁，1993），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原与周边民族地区的交流融通，为南北的全国范围大一统创造了条件；直至清朝初期，中国疆域实现了跨越北方农牧交错带并持续向北、西北的拓展（崔思朋，2023b），为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以及近代以来打响内蒙古地区武装抗日第一枪的百灵庙起义，不仅增强了北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还进一步推进与加强了北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形成。以疆土为序幕的战争冲突、文化互鉴、民族共融几乎是河套平原这一地带的历史主剧目，对于中国疆域的开拓、不同文化的交融和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与重大意义，彰显了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的生存地域中生活方式、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的共同性（梁玉春、杨学成，202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习近平，2019）

此外，河套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多民族聚合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平台。河套平原是一个相较独立的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域，由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并被环绕，地势平坦肥沃、水草丰茂，不仅有利于中原农耕民族引黄河水灌溉田地，而且还适宜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畜牧狩猎（高学博，2022），为多元的地域文

化共同体的孕育与滋养提供了重要有利条件。它是自古生活在这里的汉、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等众多民族共同开拓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意识的冲突碰撞和文化的有机互动，亦是中华民族的汇聚整合、亦是新时代复合多元的“北疆文化”之凝聚形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习近平，2019）。民族是文化的载体（穆崑臣，2014），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生活地域和生存空间中交融汇聚，其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播必然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鉴往知来，从一开始不教胡马度阴山到万里羌人尽汉歌和洛阳家家学胡乐的行为交融、从一开始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思想融合，体现的都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群体认知和文化的交融汇聚。文化的深度交融，直观地反映在考古发掘的器物上。根据大量考古表明，目前在北京、甘肃、新疆、辽宁、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数处遗址中都发掘出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样式或者特征的青铜器（田广金、郭素新，1988）。这些实例佐证，不仅充分表明了河套平原这一北部边疆农牧交错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演进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逻辑支撑。

## 2 弓马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演进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夏征农、陈至立，2010，第1975页），具有多样性与共享性等特征，弓马文化是其一种类型，属于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它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缘起、实践活动中发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事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的孙波在《缘起与嬗变：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中认为弓马文化是“骑术”和“射术”技艺相结合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孙波、姚绩伟，2022）。而对弓马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在《弓马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认为弓马文化涵盖了体育技能、礼仪规范、马术文化、弓箭文化和射击文化等，具有丰富的内涵（李凤新，2024），为弓马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与新思路。对此，笔者在两位学者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与延申，认为弓马文化是以弓箭和马匹等为物质基础、骑射体育技能为具体表现，并且涵盖了弓箭、马术和骑射等诸多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基于我国数千年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变动性的相互影响，弓马文化演进的逻辑体现出“和而不同”的中轴线始终贯穿弓马文化纵横演变的特点。学界对弓马文化研究涉及缘起嬗变（孙波、姚绩伟，2022；李凤新，2024；丛密林、邓星华，2020）、习俗（荆学磊，2012；张林，2021）、军事（马明达，2003；唐云松，2011）、教育（李建军，1997；李俊、杨永康，2018）和发展路径（潘仲华、李凤新，2024a；谢京燕等，2022）等方面，为进一步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北疆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拓宽了视野思路。终归一言，无论何种研究方向，其最终目的普遍指向共存、共建、共享背景下弓马文化的责任和担当。弓马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纵横互动中积累与传递、传播与渗透，在多民族的共同塑造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 2.1 弓马文化演进的历史逻辑

根据文化纵向和横向的运行规律，分析弓马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演进的历史逻辑。弓马文化在纵向朝代更替和横向不同民族具体交往交流交融中进步，蕴藏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逻辑理念。

以弓箭和马匹等为物质基础、骑射体育技能为具体表现的弓马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长期存在，得益于它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对骑射何时形成存在着不同认识，但都认为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成建制弓骑兵始于战国的赵武灵王时期（贡琰等，2021；白立超、白志伟，2023）。这一观点被史籍记载所印证，据《战国策》载，“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刘向，2015）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实施的以“胡服”为开端、“骑射”为目的、扩地千里为结果（常静，2023）的“胡服骑射”政令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改革（白立超、白志伟，2023）。它通过对军备服饰的革新，进一步促进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宪东，1980），为后继朝代弓马文化的交流互鉴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琰、陈雨石，2021）树立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逻辑起点。回顾历史，承秦制的汉朝通过与北方匈奴具体的交往交流，加大了对马政、弓骑兵的重视与发展（钟少异，2022），不仅为中原地区弓马文化的始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指明了发展方向，还为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的初步形成砥砺前行贡献了强大的青春动能。南北朝时期

的北魏在与北方柔然的军事战争中交流互鉴，以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骑射技能统一北方，对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进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和多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隋唐的一统与文化的包容开放，以及辽金宋的分治和元明清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同民族、国家弓马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层面上的纵向积累与传递、横向传播与渗透，它在多民族长期的交织融合与交流互通过程中不断承袭、发展与演变，蕴含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逻辑理念直观地反映了人类一种目的性与实践意义都相对明确的行为。正如，近现代以来弓马文化在“那达慕”等活动中的赓续与发展，各民族以骑射比赛为依托促进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在骑射文化互鉴共融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弓马文化的认识、认知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它蕴藏的逻辑理念为新时代背景下北疆文化建设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和有效支撑。

## 2.2 弓马文化演进的理论逻辑

纵览弓马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演进历史，其潜藏着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的交往交流和互鉴共融，各民族在史实中共同塑造的“包容、连续与大一统”等理念彰显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特征。弓马文化以具有充足机动性（葛根高娃、王佳，2015）的“骑射体育技能”为表现，存在于不同民族短暂的军事战争与长期和平共处的纵横互鉴共融中，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巩固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弓马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包容性，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稳定。它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承载实体，在数千年历史的和平共处中传承、在短暂的战争与朝代更迭中传播，由于不间断接纳与融合不同要素而更趋强健、从未中断。虽然农耕与游牧民族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不同差异，但对于弓马文化的嬗变却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历史上纵然出现过战国七雄、八王之乱和五代十国等乱局，但在弓马文化的发展与串联下最终推向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承接与一统，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弓马文化的向心力，还凸显了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展开历史画卷，弓马文化还蕴藏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逻辑理念，它

的嬗变是自古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弓马文化共生、互动、交融和重构的结果，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弓马文化所形成的精神、物质、制度传统在民族融合与共同发展下，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发生深层次、大范围的交流融合，反映了人类在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观性与主动性，也反映了各民族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互融互通。譬如，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军事政令、北魏孝文帝的“南北民族融合”，到唐朝的“胡风盛行”与明末清初的“满汉交融”，都体现的是各民族在不断丰富与发展自身弓马文化形式范围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融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是在这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逻辑理念，不断激发弓马文化在时代变迁中永葆活力与焕发新生力，逐步参与建构和夯实各民族休戚、荣辱、生死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冯文开，2024）。足以认为，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弓马文化的承袭演变为中华数千年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包容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坚实的历史底蕴，也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和价值追求所向。

### **3 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突出历史贡献**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蕴藏着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文明互鉴共融在多民族分布交错的过渡地带表现及其明显（曹海平，2023），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文化的发展必然促进文明的进步（翟继勇，2012，第2页），弓马文化的发展演进便是发生在河套平原农牧交错一带以农耕和游牧为主的多民族共生、互动、交融的结果，为多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密不可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

#### **3.1 经济之依：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有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习近平，2024）。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为多民族的聚居和经济互补创造了重要条件，不仅在具体的史实中促进了各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对弓马文化认同，还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黄河文化区和北方草原文化区的自然环境差异直接影响了各自区域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经济类型，他们显露的各自不足与对对方的需要（何天明，2008），同时反映了双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互补性。两个区域内民族在长期历史的发展中通过开拓和嵌入两种模式互补，在北方农牧交错一带的河套平原逐渐形成多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河套平原，自古以来便是农耕和游牧民族交融汇聚、文化互鉴互补的重要地带，在战国至清代的数千年历史中经历了数次农耕与游牧交替、并存的转换，这一过程中短暂的战争固然带来生灵涂炭，但它同时也是不同民族联系和融通的重要方式（王绍东、杜婷，2015）。重点是，以弓马为物质基础、骑射体育技能为表现的弓马文化在军事战争中的具象演绎即“弓骑兵”，是影响和决定战场胜败走向的重要因素，更是中原历代王朝与周边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互鉴学习的重要媒介。它在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进步、在河套平原的开拓中推动了战后的移民实边，对多民族聚居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历史，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原农业区域文化（徐亦亭，1992），通过对服饰与兵制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弓马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还在楼烦、林胡聚集的河套平原设云中、雁门和代三郡，以及移民置于九原的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北疆的开发和民族交融（王绍东、董永静，2024）。随之秦朝对河套的战后开发，设云中、北地等郡，并移民实边“迁北河、榆中 3 万家”（司马迁，1959，卷 6 第 259 页）；以及，西汉初期在边疆置朔方和五原郡、筑金城，移民百万“募民徙朔方 10 万口”“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上郡、会稽凡 72 万 5 千口”（班固，1962a，第 107 页、第 3769 页、第 178 页），体现的都是以战争为始的弓马文化传播带来的中原王朝对北疆农牧交错带的开发与治理，采取的置郡、筑城和大量移民措施为多民族的聚居和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重要条件，不仅对后继朝代在北疆的开发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映射了近现代以来我国民族分布交错居住格局形成的历史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以战争为始的弓马文化传播蕴藏着“包容互助”精神，促进了各民族在战后长期和平共处中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在弓马等物质层面的纵横互动中增强了对弓马文化的认同和共同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就是以“农耕经济”“游牧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原和边疆地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譬如汉时“明和亲之约，厚遇，通关市，饶给之”（王绍东、杜婷，2015）；隋唐时期与突厥、回纥“缘边置市”“以金帛市马”；宋朝与辽“置互市以通有无”（王绍东，2022）；以及，新时代以来我国在“一带一路”中对蒙古马的重视与发展，体现的都是各民族经济相依，以及对弓马文化的认同和持续数千年的强国梦。考古发掘表明，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汉壁画墓（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78）中的“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绘有鲜卑人、乌桓人用牛、马、羊和汉人“互市”换取粮食和生活用品的场景。历史充分证明，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促使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互相依存的经济生活，为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经济体贡献了重要力量。

### 3.2 政治之循：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推动各民族对“华夷一家”的政治认同

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习近平，2024）。以民族战争为始的弓马文化传播在开拓河套平原的过程中打破了不同民族交流的壁垒，其蕴含的兼收并蓄精神、包容性特征推动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融，为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对“华夷一家”的政治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交融汇聚而成的社会群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对“华夷一家”的政治认同集合化过程，一方面体现在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服制上的兼收并蓄。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在河套平原上传播的“胡服骑射”，从行为上改变了本国居民承袭已久的穿着习惯、从心理上冲击了农耕民族的“华夷之别”传统观念，对未来农耕民族的服饰演变与对游牧民族的认同、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史为鉴，秦朝在统一六国之后采用了部分赵国服制；汉承秦制，汉灵帝好胡服（徐蕊，2009）；魏晋以后，胡服之制空前盛行；隋唐时期，常服和朝服皆可为

胡服。南宋朱熹曰：“今世之服，大抵皆为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亦。”（阿岩、乌恩，1999，第38页）可见，从中原王朝的更迭和对胡服的承袭中可以看出农耕与游牧民族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种服饰制度层面的兼收并蓄中逐渐增强了对游牧民族的认同与肯定，进一步强化了农耕民族对“华夷一家”的政治认同。根据大量考古发掘表明，如西汉初期西沟畔墓葬M4（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81）中发现的匈奴人舞人型佩饰和大葆台汉墓中发现的佩饰近乎相似；又如，在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发掘的东汉中期壁画墓，壁画中所绘杂耍侍卫和车夫等均头戴窄沿高筒帽，顶插羽翎。（魏坚，1998，第348页）；再如，内蒙古清水河县跳岭唐代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77）的“对饮图”壁画中，所绘两位对饮人物为汉人形象，而身后侍女在形象和服饰方面均与汉人有所差别。这些史实体现的都是农耕与游牧民族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在赵武灵王兼收并蓄的弓马文化传播和传承中，各民族从一开始服饰的相互认同，逐渐上升到对彼此民族的认同，“华夷之别”观念的转变各民族融合和对“华夷一家”的政治认同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体现在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政权认同的集合化过程。历史上，自西汉以来的大多数北疆各族群统治者都认同中华文化、努力追求国家“大一统”（彭丰文，2024），正是以战争为始的河套平原弓马文化传播，从客观层面上促进了农耕和游牧民族的交融汇聚、推进了北疆各民族融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回顾历史，西汉时期的匈奴冒顿和之后的单于都曾任用汉官与运用汉政权的统治经验，以及汉宣帝时的南匈奴归附并以“汉朝藩臣”自居，不仅反映了匈奴对西汉政权的认同与肯定，还体现了在制度层面上的学习与借鉴；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建立的许多政权之国号，多数选择以中原地区曾有的，如四燕（前、后、南、北）、三秦（前、后、西）、二赵（前、后）、夏和北魏等，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在制度、礼仪、律例等政治领域与中原汉族的融合，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还进一步推动了农耕与游牧政治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唐太宗“天可汗”的称号，是表明北疆各民族对“华夷一家”政治认同的有力佐证；康熙帝曾指出“满洲、蒙古、汉军和汉人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1985，第489页），促进了清朝多民族的融合。历史上，弓马文化的传播在游牧与农耕

民族制度层面的学习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增强了对中原农耕民族和其政权的认同，还进一步化解了“中国”“外夷”的隔阂，各民族的信念相同为民族融合和对“华夷一家”的政治认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 3.3 文化之融：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推进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习近平，2024）。弓马文化在北方农牧交错带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关系的发展，还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上层建筑的文化传播、汲取与交融，对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贡献了重要力量。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改变，都是受到思想文化的引导。各民族只有发展本族文化并吸收外来文化，才能发展整个中华文化。（孔庆臻，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李大龙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源头有着详细阐释，认为其根源是先秦的“服事制”与汉武帝“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李大龙，2017）。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源头与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有着密切联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2009），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武帝的北疆开发推动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农耕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之融一方面体现在弓马文化精神的共同培育，两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共同的弓马文化注入了农耕民族的包容互助基因和游牧民族的勇敢拼搏基因，培育的弓马文化“包容互助、勇敢拼搏”精神在精神层面共筑了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原周边地区民族对中华儒家文化的认同与学习。回溯历史，中华文化之所以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在汲取和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复和发展。例如，汉代的匈奴等民族将一些上层子弟安置在长安等地学习汉文化；如北魏的拓跋鲜卑自上而下对中原汉语言和汉文化的学习；又如西夏、辽、金对中原儒家文化的主动接受与吸收；再如忽必烈从《易经》中取“乾元”之义，将国号定为“大元”。以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升华形成的强大向心力和

凝聚力。正是由于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从而引起“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源头，中华民族才能在不断的交流互鉴过程中持续实现自我突破与发展。在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中，各民族更应该以包容互助精神不断加强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汲取、学习与互鉴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不断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4 北部边疆的弓马文化传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自战国以来，北部边疆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发生碰撞和交融的核心地带，其间纵然不乏短暂的对立和冲突，但也由此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与融合。在各民族共同开拓北疆的历史中，弓马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沟通、润滑与凝聚作用，不仅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联系的坚强纽带，也是促成北部边疆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推进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

### 4.1 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古代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根基（习近平，2024），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战争为始的弓马文化传播在北疆河套平原的开拓与治理中成长、进步，为各民族聚居和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条件，不仅推动了北疆各民族血脉交融与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还强化了各民族在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以弓箭、马匹为基础和骑射体育技能为表现的弓马文化在古代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既是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国家边疆安全与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它在军事领域中的强弱影响着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地区的国家政治策略，由此衍生了通过以“和亲”的方式达到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张烈，1988）。和亲始于汉高祖刘邦在“平城之围”后，史称“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班固，1962b，第3830页），自此和亲便成为了中原历代王朝处理族群关系和治理边疆的重要政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譬如，“昭君出塞”成为汉匈和亲的千古佳话，处于北方农牧交错一带的河套平原在长时间内

更是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如，北魏孝文帝等上层阶级带头与汉族门阀通婚，促进和带动了下层广大人民之间的相互通婚；又如，唐朝统治阶级长期与鲜卑通婚，促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再如，伴随着清代上层阶级的满蒙联姻，各族陪嫁人群积极融入到北疆社会（李德锋，2024）。体现的都是不同民族上层阶级之间的和亲或通婚的融合方式，为不同族群大众之间的互通婚姻起到带头或首肯作用，各民族建立的血脉相融关系共同维护了北部边疆的和平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在以战争为始的弓马文化传播与长期和亲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互通婚姻、血脉交融的历史结果是互为“甥舅”关系（李凤山，1995），在这过程中各民族结成休戚、荣辱、生死和命运与共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不仅构建了血脉相连的“甥舅”之谊与历史记忆，还进一步推动了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回顾历史，匈奴冒顿单于的后人刘聪说“吾又汉氏之甥”；又如，回鹘顿莫贺可汗讲到与唐朝的关系“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欧阳修、宋祁，1975，第6124页）；再如，甘州回鹘与宋朝的往来书信中均以“甥舅”相称。体现的都是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和亲”及其“甥舅之谊”集体记忆的认同与赓续，这种记忆的历史追溯和情感的相互亲近有助于打破民族边界和维护北疆安定，可使各民族在共筑政治格局、互补物质经济、共享社会文化的基础上淬炼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和亲”“甥舅之谊”始于河套平原的弓马文化传播，不仅体现了中原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北疆的重视与有效治理，还奠定了北疆的弓马文化传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 4.2 推进北疆弓马文化建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2023）这一重要讲话为新时代视域下文化的发展既指明了方向，也揭示了文化建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就北疆弓马文化而言，不仅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内蒙古地区现代化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它是历史上的各族人民在北部边疆的开拓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在各民族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中互动、共生，蕴藏着包容互助、勇敢拼搏和兼收并蓄等精神，是各民族人心归聚和精神相依的强大纽带。北疆弓马文化的传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推动了农耕与游牧民族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淡化了“饮马长江”“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民族对立与冲突，还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的彼此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北疆弓马文化建设是中华各民族对持续了数千年强国梦的赓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通过举办骑射比赛和弓马文化活动，可以打破民族边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可以激发各族人民体育热情和培养民族体育精神；可以引导各族人民牢牢将休戚、荣辱、生死和命运与共的一体理念扎根于心；可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社会和谐与边疆稳定。生活在中国北部边疆的各民族及共同培育的弓马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推动并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也决定了北疆弓马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 5 结语

以史为鉴，河套平原上的弓马文化传播对中华各民族的交融汇聚和文化融通具有突出的历史贡献、重要地位和作用。弓马文化在中原历代王朝的更迭和社会的发展中承袭演变，树立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逻辑理念和蕴藏的包容互助、兼收并蓄、勇敢拼搏精神，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加深了各民族的血脉相融和情感相亲，还演绎着各民族文化记忆的时代呈现。基于此，在新的起点上以北疆弓马文化建设为保障，加强各族人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认识和认同，持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处理好、解决好新征程视域下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习近平. (2019).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实践(思想理论版), (10), 12–13.
- 杨盼. (2019). 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时代考量——基于河湟文化的镜像分析. 广西民族研究, (5), 73–79.
- 范君, & 詹小美. (201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方略. 思想理论教育, (8), 49–55.
- 拉铁摩尔. (2005).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唐晓峰,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巴菲尔德. (2011). 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 (袁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大龙, & 刘壮壮. (2023). 试论北疆文化的范畴、内涵与价值. 内蒙古社会科学, 44(5), 33–39, 2.
- 朱尖. (2024). 试论北疆文化的学理与实践定位. 内蒙古社会科学, 45(1), 33–39.
- 朝戈金. (2024). 多维度多层次多限域: 全面理解北疆文化的特性与特征.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6(3), 7–8.
- 刘志戔. (2024a). 北疆文化在构建中华文明统一性中的历史意义. 内蒙古社会科学, 45(2), 31–37.
- 崔思朋. (2023a). 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内蒙古社会科学, 44(6), 26–34.
- 康建国, & 翟禹. (2023). 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 内蒙古社会科学, 44(5), 40–46, 213.
- 王彦, & 吴楚克. (2024). “北疆文化”的历史源流、精神特质与时代价值. 中国民族教育, (2), 62–64.
- 包银山. (2024). 北疆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引与路径选择. 内蒙古社会科学, 45(2), 23–30.
- 李凤新. (2008). 中国北方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演进.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61–64.
- 潘仲华, & 李凤新. (2024a). 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当代体育科技, 14(8), 114–117.
- 潘仲华, & 李凤新. (2024b).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北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价值研究. 当代体育科技, 14(10), 119–121.
- 陈智, & 宋春霞. (2021). “共同体”语义下对“中华民族”的重新审视. 内蒙古社会科学, 42(2), 10–16.
- 王露璐. (2014). 共同体: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及其伦理意蕴. 伦理学研究, (6), 77–80.
- 斯塔夫里阿诺斯. (2005). 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第 7 版, 下册) (董书慧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韩茂莉. (2016). 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中国文化研究, (2), 71–79.

- 王绍东. (2018). 论阴山对匈奴族生存与发展的价值.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39(1), 61-65.
- 赵占魁. (1993). 内蒙古后套平原古城考——兼与王北辰先生商榷.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4), 59-65.
- 崔思朋. (2023b). 北方农牧交错带与北疆文化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5(6), 24-25.
- 梁玉春, & 杨学成. (2024, 8月27日). 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hXmxt0fewRVW\\_wwRwqIFzg](https://mp.weixin.qq.com/s/hXmxt0fewRVW_wwRwqIFzg)
- 高学博. (2022). 河套文化的由来及其类型特点.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1), 83-90.
- 穆崑臣. (2014). “同化”与“异化”: 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35(6), 54-57.
- 田广金, & 郭素新. (1988).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 考古学报, (3), 257-275.
- 夏征农, & 陈至立. (主编). (2010). 辞海: 第六版缩印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孙波, & 姚绩伟. (2022). 缘起与嬗变: 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 体育学研究, 36(1), 103-112.
- 李凤新. (2024, 7月23日). 弓马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source=share&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share\\_to=copylink&art\\_id=10722281675401506849&ptype=-1&item\\_id=10722281675401506849](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source=share&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share_to=copylink&art_id=10722281675401506849&ptype=-1&item_id=10722281675401506849)
- 丛密林, & 邓星华. (2020).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形成考略. 体育学刊, 27(5), 27-34.
- 荆学磊. (2012). 浅谈明朝时期的端午射柳文化. 兰台世界, (36), 122-123.
- 张林. (2021). 略论满族骑射文化. 满学研究(东北大学), (0), 153-160.
- 马明达. (2003). 中国古代射书考. 暨南史学, (0), 1-41.
- 唐云松. (2011). 清代满族八旗骑射文化的崛起与流变.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9(3), 22-25.
- 李建军. (1997). 明代武举制度述略. 南开学报, (3), 56-58.
- 李俊, & 杨永康. (2018). 略论乾隆帝讲习骑射. 晋阳学刊, (2), 130-133.
- 谢京燕, 孟欣欣, & 彭畅. (2022). 弓马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 当代体育科技, 12(36), 116-119.
- 贡琰, 陈雨石, & 郝勤. (2021). 超越时空: 丝绸之路上的射箭文化传播暨“射艺之路”的形成.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47(3), 52-59.
- 白立超, & 白志伟. (2023). 论赵武灵王“胡服”改制的本质及影响——兼论战国中期骑射与赵国的关系.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43(2), 87-92.
- 刘向. (2015). 战国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常静. (2023). 战国赵北长城历史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

- 宪东. (1980). 从“胡服骑射”谈起. 内蒙古社会科学, (1), 123.
- 贡琰, & 陈雨石. (2021). 骑射形成时间地域考: 一项基于考古因素的射箭全球史试探.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44(5), 148-160.
- 钟少异. (2022). 冷兵器时代之战车的作战运用与衰落. 春秋, (3), 61-64.
- 葛根高娃, & 王佳. (2015). 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体系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36(4), 177-183.
- 刘志戡. (2024b). 统一性与连续性: 北疆文化的突出个性.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6(3), 5-6.
- 冯文开. (2024). 包容与创新: 北疆文化永续发展的生命力.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6(3), 11-12.
- 汤素兰. (2023).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民主, (8), 11-12.
- 曹海平. (202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西口文化的价值彰显及调适转化. 内蒙古社会科学, 44(3), 18-26.
- 翟继勇. (2012). 体育文明的现状与发展探索. 光明日报出版社.
- 习近平. (2024, 9月28日).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002.
- 何天明. (2008). 北方草原文化交融现象的必然发生与历史作用.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 43-48.
- 王绍东, & 杜婷. (2015). 论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多重功能.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36(2), 37-42.
- 徐亦亭. (1992). 论中国古代的民族区域文化.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6), 64-68.
- 王绍东, & 董永静. (2024). 赵国的北上战略促进民族交融与边疆开发. 邯郸学院学报, 34(3), 18-26.
- 司马迁. (1959). 史记. 中华书局.
- 班固. (1962a). 汉书. 中华书局.
- 王绍东. (2022). 论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与影响. 内蒙古社会科学, 43(1), 75-82, 2.
-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1978).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文物出版社.
- 徐蕊. (2009). 从服饰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30(3), 34-37.
- 阿岩, & 乌恩. (1999). 蒙古族经济发展史. 远方出版社.
-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1981). 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 内蒙古文物考古.
- 魏坚. (1998). 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977). 内蒙古清水河县跳崩墓地. 文物, (1).
- 彭丰文. (2024). 北疆文化的历史根基与演进历程. 内蒙古社会科学, 45(4), 24-31.
-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1985). 中华书局.
- 孔庆臻. (1986). 文化交流是民族团结的纽带. 内蒙古社会科学, (5), 36-42.
- 李大龙. (2017). 自然凝聚: 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4(3), 68-75.
- 马克思, & 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 张烈. (1988). 从白登之围到昭君出塞——论此阶段的汉匈关系及汉王朝的决策. 社会科学战线, (3), 132-140.
- 班固. (1962b). 汉书 (颜师古, 注). 中华书局.
- 李德锋. (2024). 和平性: 北疆文化追求与传承的和谐发展理念.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6(3), 9-10.
- 李凤山. (1995). 长城带民族融合的特点.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6), 55-59.
- 欧阳修, & 宋祁. (1975). 新唐书. 中华书局.
- 习近平. (2023).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求知, (9), 4-7.